



《解读中国》丛书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凯风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

解读中国民主

——西方中国学家的视角

徐浩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解读中国》丛书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凯风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

解读中国民主

——西方中国学家的视角

徐浩然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中国民主：西方中国学家的视角 / 徐浩然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

(理解中国丛书)

ISBN 978-7-5161-3221-0

I. ①解… II. ①徐…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37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丛书顾问 谢维和 俞可平

丛书主编 景跃进 张小劲

执行主编 谈火生

编委会 (姓氏名画为序)

王长江 任剑涛 朱光磊 何增科

余逊达 肖 滨 陈明明 杨雪冬

杨光斌 周光辉 张小劲 郎友兴

徐湘林 谈火生 景跃进 燕继荣

总 序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老子语）。自中国被动地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发生交往以后，“解读世界”与“解读中国”始终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为之思虑不止的绵亘主题，并且在“落后挨打”的背景下，又构成了“自强于世”与“改造中国”的认知基础。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近代以来的这一“双重解读”是在一种非常态的历史进程中启始的。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因连续挫折和失败而导致的心态失衡、情绪焦虑乃至血脉贲张，极大程度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方式及其结果。笼统而言，这一进程在五四时期趋于顶极，并形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认知模式。其后，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无论是文争还是武斗，菩萨在换，但庙宇不变。在某种意义上，当初的改革开放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上路的，至少对于中国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

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于一个经历三十年巨变的国家，又当如何相看？如果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先辈们曾经遭遇的挑战，那么，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能否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提供了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观察历史和现实的参照点？它是否足以使我们对五四以来形成的基本认知模式提出挑战，并要求我们重新“解读中国”？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模式”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而展开的讨论，已经以一种极其直白的方式，迫使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这一问题，并尝试选择自己的回答。我们尚无法预期这一争论将如何终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选择哪一种回答方式，也不管未来将呈现何种面貌，处于当下的我们确实需要重新“解读中国”，包括它的历史与传统、结构与过程、制度与人民，以及内部现实与外部环境。

作为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和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政治发

展研究所联袂主持的学术合作项目，本丛书将秉持一种开放的立场，侧重发表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海内外著述。当然，这一“政治优先”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学科性的封闭。一如《解读中国》的标题所示，丛书的收录范围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读中国而言，政治是重要的，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故而，大凡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作品，只要合乎学术规范，能增进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本丛书将畅怀收纳。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某种程度上，本丛书的操作也采纳这一方法。看准了方向先做起来，再根据实践的结果做出修正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反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恳望学界朋友关注这套丛书，并时常给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把这事情做好。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
凯风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
2012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一 西方对中国民主的认知变化	(1)
二 拟探讨的问题与评析范围	(8)
三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	(10)
四 西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三个阶段	(29)
第二章 经济—趋同视角	(35)
一 共产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反思旧定位和形成新认识	(36)
二 乐观期待：融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自由化政治改革	(58)
三 深层思考：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走势	(67)
四 经济—趋同视角简评	(79)
第三章 社会—体制视角	(85)
一 东欧剧变引出的观察：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 复杂性 with 独特性	(88)
二 适应社会转型：政党—国家体制民主化的动力问题	(98)
三 推测中国权威主义体制民主转型的前景	(122)
四 社会—体制视角简评	(130)
第四章 国家—治理视角	(135)
一 “9·11” 恐怖袭击后的省醒：民主不等于善治	(138)
二 治理导向：解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	(157)

三 弹性权威主义的民主化：一个开放性话题	(187)
四 国家—治理视角简评	(199)
第五章 评析	(203)
一 将西方自由民主普世化的意图	(204)
二 政治科学理论的“价值负载”	(215)
三 “民主和平论”、“中国威胁论”与国家利益	(226)
第六章 启示	(237)
参考文献	(247)
附录一：国内外学者对西方中国学的研究述评	(282)
附录二：西方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格局及本书的资料获取	(292)

第一章 概述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曾使中国社会陷入一场内乱。奇怪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却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青年的追捧。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学者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那时一致相信毛主义（Maoism）正在成功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①但20世纪70年代后，这些追捧“文革”的活跃分子反而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弗里德曼与黎安友成为批判当代中国政治最激进的学者。2006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与黎安友讨论时甚至断言：“共产主义制度在几年内而不是几十年内崩溃”。^②在西方世界，这几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皆以严谨的学风著称，为什么他们对中国政治形成了过于乐观或极其悲观的判断？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还有哪些亟待我们回应的言论？带着诸种疑惑，笔者开始关注西方学者的中国政治研究，最终将落脚点放到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方面。

一 西方对中国民主的认知变化

西方人对民主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例如美国有一个调查：“一般地说，这个国家中最使您感到自豪的是什么？”结果85%的受访者引证了某些美国政府或政治传统——宪法、政治自由、民主以及类似的东西。^③无

① [美] 伊多·奥伦：《美国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② [美]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9页。

③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论在冷战时代还是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民主始终是西方国家干涉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依托之一，特别是1978年以来尤为明显。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的首要的目标。”^① 西方向中国输出民主，这一做法的主要前提是认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够民主，不符合时代要求。该评价基于两点：一是中国没有实行国家首脑的普选，也没有确立公民对政治权力发挥实际影响的机制；二是党和政府对大众媒体的管理比较严格。从根本上说，西方不接受中国的政治体制关键在于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主张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声明西方的多党政治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原则不适合中国。与西方相比，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观察中国》中指出：“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人权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成为和美国一样的法治社会，但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似乎难以实现。”^②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西方总想表达他们的民主观，而中国常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因此，中西之间一直面临着千变万化的文化斗争和协调，这促使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对中国民主政治抱有持续的兴趣。由于中西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认知便折射出较为复杂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冷战正酣之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酝酿了一份推行冷战蓝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份文件提出一条建议：“建立由美国人领导的强大的同盟体系；最后，通过‘使俄国人民在这项事业与我们结盟’来从内部侵蚀‘苏联极权主义者’。”^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将已经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划归为斯大林式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② [美] 费正清：《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 [美] 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82页。

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它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这种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污蔑尽管是冷战的产物，但不是偶然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后启蒙时代西方文化建立世界的观念秩序，在现代文明大叙事下确定不同民族国家在世界文明进程与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与意义，目的在于在差异与等级秩序中确立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构成知识扩张与经济政治军事扩张的不均衡的、动态的交换关系。”^①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霸权影响下，西方早就形成了野蛮化中华帝国形象的策略，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即为如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给中国贴上的极权主义标签，就如同“黄祸论”的延续。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越南战争使美国深陷丛林之中，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以及犯罪率急速上升。西方国家的青年人在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文化准则的文化革命中组成了先锋队。西欧和美国的学生对他们国家有关战争与社会重组的承诺强烈不满，于是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游行以影响他们所在的大学，目的是推动和平、结束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争，以及废除大学里的不平等规定和限制。在美国，1964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发起自由演讲运动，鼓励在校园里自由表达政治观点。四年以后法国学生在巴黎设立追忆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路障。^②在这场震惊世界的法国“五月风暴”中，“毛派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把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口号当做毛泽东思想，并将他们误读的毛泽东思想与他们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的左派工人阶级”。^③在法国青年学子闹的如火如荼之时，美国一些“关注亚洲学者核心小组”（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的成员也向往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无序民主”。美国各大学校成为左派思想传播的阵地，学生运动领袖组建了拥有超出十万名注册成员的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简称SDS）。SDS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衰落前发起的最后一个行动，就是走出校园，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实现革命群众的大团结。这一运动被称为“新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坚持“民主集中制”，

①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页。

②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下，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4页。

③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抵制任何形式的“西方民主”。^①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那时西方国家许多青年人都相信那种被误读的“毛主义”，反而忽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事实。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西方社会起初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并不抱有足够的信心，但这种忧虑很快被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淹没。在西方学者看来，1978年底“在邓的争取下党开始推行广泛的改革，旨在终止‘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和乌托邦的做法，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色彩，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②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第三代专家学者逐渐把目光对准新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因此，现代化理论很快流行起来，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十分看重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巨大社会变迁，他们预测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必促使中国走向西方自由民主。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黎安友是一位具有浓厚民主情结的学者，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有四项制度变革体现出一种民主化趋势：信访工作、村干部选举、宣传系统的多元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大会选举的扩展。黎安友认为，这些改革已经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为多元；并且“比起毛的晚期统治，目前的政体更能够管理社会冲突，汇集人民的信息，获得人民的支持，并打击官僚主义”。^③显然，此时的黎安友已经放弃“文革”初期对流行于西方的“毛主义”的崇拜与向往之情。但是，他的那些乐观看法并没有坚持多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战略位置，西方世界实际只把中国当作遏制苏联的一枚棋子。因此当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过后，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不得不面对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冲突。1990年，黎安友发表《中国的危机：改革的困境与民主的前景》，批判中国通过一种僵化的集中体制（centralized system）来寻求有效统治。他还声称，一个不民主的中国会稳定强大，是难以置信的。^④类似的观点在90年代初期的西方世界比

①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② [美] R. R. 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冷战到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终结？》，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94页。

③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p. 228 - 229.

④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10 - 211.

较流行。1989年夏,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东欧剧变后大有一吞寰宇之势,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怀揣对自由民主的本能自信,又开始大肆渲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偏见,有人声称:“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僵化的列宁主义国家(ossified Leninist state),它终将屈服于不可避免的民主运动。”^①

冷战过后,“民主和平论”在西方世界甚为盛行,它成为影响美国和西欧推行意识形态外交和实施全球民主输出战略的主要理论依据。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世界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两部分,只有民主的国家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如果这一命题为真,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便意味着和平区域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当苏联东欧国家走向崩溃之时,中国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又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西方世界在“民主和平论”指引下将中国划归为不民主的国家,因此随着中国崛起他们开始担心西方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90年代初,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H. Munro)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中国威胁论”一时间风靡全球;1997年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芒罗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又将“中国威胁论”作出全面阐发。2001年华裔学者章家敦(Gordon G. Chang)出版《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中国崩溃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他声称“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有关中国未来的悲观论调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持续至21世纪初。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些政治学家开始对西方自由民主产生疑虑,转而思考国家建构问题。东欧剧变期间曾大力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已无当年的霸气,他指出:“贫困国家缺乏国家能力问题已经直接地困扰着发达国家。冷战的结束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中东、中亚和南亚等地留下了一群失败的、软弱无能的国家……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局部的,而“9·11”事件却证明,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3.

国家弱化也构成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① 实践证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推动的“选举民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难题。选举过后同样滋生腐败，治理绩效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不得不反思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呈现的民主转型。所以福山提出，在政治发展方面，美国应当把促进良好的管理而不仅仅是民主确定为自己的目标。政治发展是促进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包含国家建设和创建有效的体制这类工作，有效的体制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但其本身不一定是民主的。^②

21 世纪以来，许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逐渐明白，搞自由民主不等于实现善治。在他们中间，开始形成一些有关中国政治的乐观看法。20 世纪 90 年代初曾严厉批评中国民主与人权状况的黎安友于 2003 年发表《权威主义的弹性》，从政权制度化层面探讨为什么中共在东欧剧变后并未崩溃，并承认权威主义政体向民主化和和平过渡的可能性。^③ 华裔学者杨大力发现：中国进行了大量治理改革，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重新塑造了治理结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机器，则很难完成多数有争议的制度改革。如果中国的治理制度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变为有效的、服务型和规范的管理国家，对中国自由与民主的扩展具有深远意义。^④ 与此同时，西方舆论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一片赞许之声。2003 年，德国《经济周刊》总编史蒂芬·巴龙写道：“中国的重新崛起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法兰克福汇报》文章说：“中国经济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前景。”就连一贯以发表批评性报道的《明镜周刊》对中国也表现出敬畏，在 2004 年秋季第一期上发表《世界强国的诞生》，封面上画着一只从破裂的地球蛋壳中爬出的幼小而凶猛的龙。^⑤ 2004 年 5 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① [美] 福山：《国家建构：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② [美] 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周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5 页。

③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2003), pp. 6–17.

④ Dali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1–314.

⑤ [德] 弗朗克·泽林：《中国密码》，强朝辉译，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8 页。

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可以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2009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中还提出“中国支配论”，也颇有“中国模式”的味道。

透过西方有关中国民主的复杂认知变化，笔者发现：无论他们现在抛出“中国模式”^①还是过去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始终都没有放弃他们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法国政治学家莫瓦希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可以明证笔者的判断，他说：“西方世界的比较优势不在于人口，也不在军事、金融和经济领域，而是在观念和理想方面。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登上世界的前台，这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它却不能提供一种普世的信息。而正是这种重新复活的、寻回新的尊严和合理性的普世信息——它是我们严肃的行动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领袖们发挥才能的结果——才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比较优势。”^②所以，2003年当黎安友转向研究权威主义的弹性问题时，同样存在反对的声音。就在黎安友发表论文的同一期《民主杂志》，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吉利·(Bruce Gilley)还发表了《权威主义弹性的局限》。他认为中国民主化存在制度缺陷，威权政体要想实现民主的重大突破还面临较大的局限。^③可见，西方对中国民主的认知一直处于比较复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① 雷默提出“中国模式”，其实还隐含了一种操控中国的战略意图。首先，这源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遭到质疑；其次，一个重要考量是如何处理与（什么样的）中国的关系。雷默反对“孤立”中国或者把中国当作“威胁”对待，认为遏制中国的增长将导致动荡和混乱，进攻型的现实主义决策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对待中国的正确态度是“不把中国看成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做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长处（蓬勃发展的经济）都有着相对应的弱点（能源短缺）。中国的长处可以自己照料，它的弱点才是需要人们帮助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弱点上，中国仍然可以被操纵。”因此，雷默认为新的对华政策需要三个支柱：专注于中国的弱点，记住有时需要操纵而不是说服中国，构筑整体的环境。参见[美]乔舒亚·库珀·雷默《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2页。

② [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徐向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③ Bruce Gilley,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2003), pp. 24-26.

二 拟探讨的问题与评析范围

本书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是：（1）西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过哪些不同的视角，有哪些主要观点？（2）如何认识与评价西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研究？（3）西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为了能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叙述与评析的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第一，西方。在中国古代，“西”字的指代是变化的，先是指西王母的国度，继而指西域，接着又流转到印度西天，到宋元以后渐渐出现“西洋”的概念。本书使用的“西方”延续了以往的地理概念，可以具体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此外，本书使用“西方”主要还考虑到，“作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的符号，‘西方’这个称谓，已成为‘东方人’追求的未来”^①。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中国人有时也将“西方”视为一种文明符号。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依然存在。目前在国内外理论界，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著述中引用西方的政治科学理论，或者至少在一般概念的基础上做些转化。可是在西方学者的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却很少见到源自中国本土的理论范式。王绍光教授曾感叹道：“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②有鉴于此，笔者用“西方”这一地理概念限定国外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的范围，就隐含了一种反思西方政治文化观念的意向。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长期深受西方文明的熏染，通过评述他们有关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研究，能够深刻反省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

第二，中国学家。所谓中国学家，即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学或学术机

^①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页。

^② 王绍光：《西方政治学与中国社会研究》，载于朱云汉、王绍光、赵全胜主编《华人社会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台北桂冠图书2002年版，第23页。

构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教授、研究人员。在西方世界，我们从政府、媒体、学者或民间组织的文字言论中皆可以发现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不同观点。之所以选择中国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论点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形成的；并且自中国研究诞生以来，他们对中国政治的一些重要判断还直接影响西方国家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例如，美国著名中国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麾下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①等许多研究机构，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直接往来；法国经济社会学家纪野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法国外交部下属的 27 个研究机构之一。此外，一些出色的中国学家还受邀进入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像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Susan L. Shirk）教授，曾担任前克林顿政府太平洋东亚事务署的官员（1997—2000 年）；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1998—2000 年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亚洲政策资深主任；2004—2007 年间还在美国国防部联合战略评论中心高级评论小组任职。西方中国学家除能够影响对华政策的制定外，对西方舆论也有极大的影响力。例如，欧洲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叶胡达，经常在西方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接受电视、广播采访，就中国外交事务发表政治评论。

第三，1978 年以来的西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研究。之所以限定在这个时段，一个首要考虑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不仅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政治建设也呈现了显著的进展：农村与城市的基层民主制度创新、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扩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引起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高度关注，他们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视

^① 1951 年，白鲁恂完成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加入了普林斯顿政治庇护团（institute's defector），1956 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IS）。随后该中心开始了一个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名为 TROY 的顶级秘密研究项目，主要任务是向国会建议如何使美国的宣传有效地穿透共产主义的铁幕（Iron Curtain）。该项目强调了高度粘合美国高等院校、美国外交政策与情报部门三者间关系的重要性。白鲁恂曾致力于国防研究，并在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文化领域逐渐荣升为顶级学者。在一份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准备的关于“反叛乱的研究”的报告中他说道：“无需置疑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块制高地，它将为国内安全力量的设计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参见 [美] 伊多·奥伦《美国 and 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唐小松、王义槐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4 年版，第 226—228 页。